

4. 主治与功能 魏晋时期医药家对药物主治与功能的认识,集中反映在《别录》之中。这些内容,在《本草经集注》中以墨字附于《本经》文字之后。总的来看,两者没有突出的差异,都是以各药的主治病证为主,混列着少数较为笼统的功能,对主治和功效均缺乏应有的区别。但若进一步将两书加以比较,却可发现《别录》的内容已发生了变化。

《别录》对《本经》药物作了大量补遗,使许多常用药物的功用更加翔实可信。如茅根,《本经》认为:“主劳伤虚羸,补中益气,除瘀血血闭寒热,利小便。”而《别录》为“主下五淋,除客热在肠胃,止渴,坚筋,妇人崩中。”枳实,《本经》认为:“主大风在皮肤中,如麻豆苦痒,除寒热结,止痢,长肌肉,利五脏,益气轻身。”《别录》为“主除胸肋痰癖,逐停水,破结实,消胀满,心下急、痞痛,逆气……”对于药物功用的记载,《别录》不再像《本经》含混地称“利五脏”、“安五脏”、“除邪”等,相应改书“胸肋”、“心下”、“胃中”、“肝胆”、“治伤寒、温疫”等,因此已比较具体、准确。

《别录》增补的内容,有很多确属该药的主要功效或主治症。如桔梗“治咽喉痛”,葛根“疗伤寒中风头痛,解肌发表出汗”,酸枣“主烦心不得眠”,泽泻“逐膀胱三焦停水”等。还有一些药物的功能,《别录》在《本经》基础上虽然仅作个别文字修改,但却相当关键。如黄芪,原云“补虚”,《别录》乃云“益气”;椹实,原为“杀三虫”,《别录》则称“治蛔虫”。确与事实相符。《别录》新增药品对主治功能的叙述多数简洁实用,较少虚泛不实之词。如百部根“主咳嗽上气”;高良姜“主暴冷,胃中冷逆,霍乱腹痛”;檳榔“主消谷,逐水,除痰癖,杀三虫”等。但其中也有松叶“……不饥,延年”;松根白皮“主辟谷,不饥”之类记载,说明道家方士的影响依然存在。

这一时期对特效药的寻找和应用也较重视。如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认为:“诸药一种虽主数病,而性理亦有偏著。”掌握了这种“偏著”的特殊效用,只要据其“病源所主药,便可于此处疗”。基于这种认识与观察,遂使一批药物的特殊效用从此得到确认。如檳榔、雷丸、牙子除寸白虫;海藻、昆布消瘰疾;常山、蜀漆、青蒿治疟等。这些发现,为临床提供了确切可靠的有效药物。

此外,陶弘景对药物主治与功能的关系独具见地,面对当时本草多言主治病证而缺少相对应的功能,陶弘景指出:“今药之所主,止说病之一名,假令中风,乃有数十种;伤寒证候,亦有二十余条……病之变状不可一概言之,所以医方千卷,犹未尽其理。”此未尽之理,当然是确定该药对于伤寒、中风有何功能,应当施于哪种证候了。陶弘景对此虽未能尽予解决,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

5. 配伍 《本经》有关“七情”(包括配伍和单行)之说迄今仍是不刊之论。魏晋时期,医药家对药物“七情”的研究高度重视,多有增益。《雷公药对》所谓“主对”,就是讨论药物相互间的畏恶反忌及“相得共疗某病”等配伍关系。北齐徐之才又有所补充。陶弘景亦将其所见《神农本草经》及《雷公药对》这一内容集中汇列于《本草经集注》序例之中,以解“今按方处治,必恐卒难寻究”之苦。当时讨论配伍,亦不止是《本经》之药,如《别录》前胡,就有“半夏为之使,恶皂荚,畏藜芦”等类似记载。现存《证类本草》序例下,列有所谓“七情表”,汇集“二百三十一种有相制使”的药物,其中近200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成果。如款冬花,杏仁为使,得紫菀良;人参,茯苓为使;龙骨,得人参良;大黄,黄芩为使等相须相使的药对,多为后世所常用。干姜杀半夏毒,大豆杀乌头毒,半夏畏生姜,附子畏甘草等制约毒性的相杀相畏关系,仍为今人时常选用。又干姜恶黄连,牡蛎恶麻黄,白薇恶干姜等属相恶者,其功用往往相反,在一般情况下无疑应该避免合用。

(三) 炼丹与制药化学

东汉末年,炼丹家与新兴的道教合流,使炼丹术加速发展,至魏晋南北朝进入了鼎盛时期。

东晋的葛洪是我国著名的炼丹家之一。虽然他研究炼丹术是受方士求仙思想支配的,但其对化学和医学的发展却作出了巨大贡献。葛洪将炼丹理论系统化,将操作技术具体化,在其所著《抱朴子》中,展示了许多化学实验的成果。如从“丹砂烧之成水银,积变又还成丹砂”和“铅性白色而赤之为丹,丹性赤色而白之以为铅”中,可以看到汞和硫化汞、铅和氧化铅之间分解和化合的可逆性;从“曾青涂铁,铁赤为铜”中,可以看到铁与铜离子的置换反应;从烧雄黄、雌黄于下,“器皆生赤乳”中,可以看到砷的硫化物的升华反应;从“三十六水法”中,还可以看到当时不仅进行无水化学反应,而且对水溶液及无机酸也有所认识和研究。通过炼丹实践,对硫、铅、铜、雄黄、丹砂、消石、胆矾等几十种金属、非金属、化合物或合金的化学性质,作了认真的观察和研究。其操作技术已采用了烧灼、升华、结晶、蒸馏、蒸发、浸取、水浴、沙浴等法。在基本知识和实验技术方面,为后世化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在建屋、立坛、安炉、置鼎等仪器设备的制作方面,对后世也颇多启迪。

陶弘景亦是善于炼丹的医药学家,著有《合丹法式》、《集金丹黄白要方》、《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》等炼丹书。他在炼丹中也观察到很多可贵的化学现象,如消石“以火烧之,青紫烟起”便为一例。能产生这一焰色反应的硝酸钾是比较纯净的,可见陶弘景的炼制技术具有很高的水平。陶弘景用这一方法鉴别当时相混难分的消石和芒硝,这大概也是用化学方法鉴定药材的嚆矢。

炼丹术的一些新发现,扩大了金石药物的来源和应用范围。如《别录》称硫黄为“矾石液”,大抵为烧矾石使之氧化为皂矾和硫黄之故。又如《本草经集注》谓铅丹“即今熬铅所作黄丹”,粉锡“即今化铅所作胡粉也”。这些药物的应用与炼丹不无关系。这一时期炼丹家和医药家已用铅丹和植物油炼制成铅膏药(见《肘后方》);以水银、食盐、消石等为原料制取了白降丹(见《崔氏方》);以棉裹膏或丹药制作药签(见《刘涓子鬼遗方》)。这些药物或制作方法,至今仍为中医外科所沿用。因此,中国古代的炼丹术为现代化学和制药化学的先驱,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。(彩照3)

三、主要本草学家

魏晋时期有一定影响的本草学家有吴普、李当之、陶弘景、徐之才等。另外,葛洪对制药化学,雷教对药物炮制都有贡献。现列举主要本草学家如下。

(一) 吴普

吴普的生卒年代,正史无从考证。其有关生平,仅可见于零星材料。据《华佗别传》所记,吴普年将九十,魏明帝曹睿曾召见并令其作五禽戏。魏明帝在位时间是227—239年,由此大略可知吴普约生于137—149年之间。又葛洪《抱朴子·至理篇》言“有吴普者从华佗受五禽戏,以代导引,犹得百余岁”,则知其卒于250年左右。另据《后汉书·华佗传》记载,吴普为广陵人(今江苏江都县东北),为华佗弟子,“普依准佗疗,多所全济”;“年九十余,耳目聪明,齿牙完坚”。所以,吴普当为华佗的主要传人。著有《吴普本草》。

(二) 葛洪

字稚川,自号抱朴子,西晋丹阳句容(今属江苏)人,约生活于281—341年间,具体生卒年代无考。为江南有名医药家、炼丹家,更是以道教为主的儒道合一论者。

葛洪的祖父、父亲均居东吴要职。他的祖父葛玄擅长神仙、